

• 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机制*

张书维¹ 许志国² 徐 岩³

(¹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²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广州 510225) (³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 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民众的政治信任，进而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非合作行为的典型表征。然而，国内外研究中至今没有直接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此，本研究将社会公正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将政治信任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采用实验室研究、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社会公正对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建立其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并进一步分析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有望提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一方面在理论上深化和拓展本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实践中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促进合作行为。

关键词 社会公正；工具信任；情感信任；结果依赖性；合作行为

分类号 B849:C91

1 问题提出

近年来，社会公正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何维护？《报告》里进一步阐述：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胡锦涛, 2012)。李克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四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亦指出：“社会公正是发展的活力之源。我们要建设廉洁政府、法治政府，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使各类市场主体都能在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

境中竞争发展，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在公平的机会、公平的规则面前，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应有的成功。”胡锦涛与李克强所说的权利公平与机会公平，正是分配公正(distributive justice) (Deutsch, 1975)的主要内容；而规则公平则是程序公正(procedural justice) (Thibaut & Walker, 1975)的应有之义。二者构成了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的核心。只有社会公正存在，才能保证教育公平、就业公平、创业公平的充分实现。

事实上，社会公正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论语》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却相对滞后，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渐趋严重(Gustafsson, Li, & Sicular, 2008; Whyte, 2010)。这些问题对中国的社会转型构成挑战，进而引起对“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反思(孟天广, 2012)。转型社会中，对社会公正的认知直接决定着公众对经济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Wegener, 2000)，这构成了政治信任(political

收稿日期：2013-10-31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30117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01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3wkpy45)。

通讯作者：张书维, E-mail: zhshuw2@mail.sysu.edu.cn

trust)的主要来源(Levi & Stoker, 2000; Jost & Kay, 2010)。当下频发的群体性事件,即是政府公共管理失误和公众政治信任下降的恶果(王二平, 2009);进而导致民众各种不合作(如不响应政府的号召)乃至对抗政府的行为(如群体性事件)。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理解民众与政府合作的动机(Rankin & Tyler, 2009)。合作(cooperation)指通过自身行动帮助群体或组织变得有效和成功(Tyler, 2011a),包括克制私利(self interest)服从规则和实施有益于群体的行为,如交税乃至入伍参战(Tyler, 2008)。在此,本研究将合作进行以下工作定义:合作是指个体对政府实施的一种帮助行为,旨在实现群体的利益及目标。本研究从社会公正的视角出发,探讨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对合作行为的路径模型及其如何受到内外部因素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有望更加准确地预测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并通过提升公正感、强化过程变量(政治信任)、干预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等策略为增加合作行为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2.1 社会公正与合作行为

社会公正是组织公正(organizational justice)外延的扩展,可分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分配公正侧重于结果,指影响个体福祉的条件和物品分配的公正性(Deutsch, 1985),如结果公正(outcome justice)和机会公正(opportunity justice)。程序公正侧重于过程,指用于决定结果的方法、机制、过程的公正性(Folger & Cropanzano, 1998),如信息公正(informational justice)和人际公正(interpersonal justice)。关于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组织领域已有大量的研究(Colquitt, Conlon, Wesson, Porter, & Ng, 2001; Oreg & van Dam, 2009)。一个稳定(robust)的结论是公正感能促进个体的有效合作,从而实现较高质量的社会协调(Tyler, 2012)。近年来的研究焦点开始由组织管理领域向公共管理和社会领域转变。这其中,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尤受瞩目:Sunshine 和 Tyler (2003)发现,程序公正而非分配公正直接影响民众对警察的支持;Murphy 和 Tyler (2008)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程序公正的感知受到快乐或愤怒的情绪中介,随后影响人们的顺从行为

(compliance behavior);除了情绪,群体认同也成为程序公正与规则遵守(rule-following)的中介变量(Tyler, 2009);当公共政策对民众不利时,程序公正对民众的公共政策支持行为影响更大(Wu & Wang, 2013);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的正相关已在民众对法律实施的配合行为(cooperate with law enforcement)中得到了跨情境的验证(Huq, Tyler, & Schulhofer, 2011);即使对于精神病患者而言,更强的程序公正感,亦能带来更多的合作与更少的反抗(Watson & Angell, 2013)。而对于分配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虽然提出较早,但始终未引起公共管理学界足够的注意。

国外学者的研究更加重视程序公正,一方面有其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原因;另一方面,是基于“只有保证分配过程的公平性,才能有分配结果的公平性”这一西方社会的普遍共识之上。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分配公正在过去乃至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孙明, 2009; 李骏, 吴晓刚, 2012)。换言之,程序公正在我国的作用,似乎并没有在西方文化下那么显著。因而在公共管理领域内探讨分配公正及其影响,对于研究中国面临的社会公正问题,具有特殊价值。张婧(2010)的研究发现,灾难情境下,分配公正感对合作行为的作用更强;非灾难情境下,程序公正感的作用更强。不过研究中仅对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进行了测量,缺乏操纵。另一项来自荷兰小企业主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个人规范(personal norms)较低的人群中,分配公正与交税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Verboon & Goslinga, 2009)。目前尚缺乏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影响民众对政府合作行为的实验室研究。因此也无法对社会公正与合作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加以确认。

2.2 政治信任与合作行为

政治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government)或政治制度(institutions)所抱有的信心,相信他们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符合他们预期的政策结果(Levi & Stoker, 2000)。作为权威信任(trust in authority)的一种,政治信任是衡量民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实践中,它既体现着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同时又是政府政策有效性的基础。

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主要遵循两个理论视角:制度视角(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和文化视角

(cultural perspective) (Mishler & Rose, 2001; 熊美娟, 2010)。制度视角将政治信任看成是政治制度(政府)运行的后果。其中最核心的是政府绩效(performance), 高水平的绩效导致公民对于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Wong, Wan, & Hsiao, 2011)。文化视角强调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过程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 也包括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Shi, 2001)。简言之, 制度视角是一种结果导向(outcome-orientation); 文化视角是一种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ation)。根据信任对象的不同, 政治信任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 对抽象的政治体制的信任, 对具体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军队或某一政治领导人的信任等(张婧, 王二平, 2010)。虽然政治信任的维度划分有不同的结果, 借鉴 McAllister (1995) 对人际信任的分类, 最终可将这些维度归为认知和情感两类。认知信任(cognition-based trust)涉及绩效相关的认知, 包括能力、责任、可靠性和可依赖性等; 情感信任(affect-based trust)涉及个体间的情感联系, 表达的是对个体福祉的真正关心和照顾, 并由此建立起的信任。研究表明, 对主管或领导的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正向影响员工对组织的合作——组织公民行为和贡献团队绩效(韦惠民, 尤丽荣, 2009; Schaubroeck, Lam, & Peng, 2011)。当然, 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也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相关, 认知信任为情感信任奠定了基础(McAllister, 1995; Schaubroeck et al., 2011)。为了与人际信任的研究相区别, 这里将政治信任的两种类型界定为工具信任(instrumental trust)和情感信任(affective trust)。前者基于对政府能力与可靠性的评价, 主要取决于政府的绩效, 是结果导向的; 后者基于民众与政府的社会互动, 反映的是民众对政府的情感联系, 更多体现的是过程导向。这一分类已被研究者用于分析国际关系中联盟信任的类型(尹继武, 2008)。

政治信任与合作行为的研究显示出二者较稳定的正相关: Chanley, Rudolph 和 Rahh (2000)的调查显示, 民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度受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政治信任水平越高, 民众对牺牲自身物质利益的公益政策的支持度就越高(Hetherington, 2005; Rudolph & Evans, 2005)。高政治信任的民众对政府的相关要求会更积极的遵守和参与, 如缴税、投票和自觉遵守守法

(Hetherington, 1999; Scholz & Lubell, 1998; Tyler, 2011b)。尽管大量研究比较一致地揭示出政治信任对合作行为的正效应, 但已有研究并未将政治信任区分为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来探讨, 因此无法辨别两种信任在促进合作行为上的差异。事实上, 一项人际信任领域中有关认知信任与情感信任对于社会困境(social dilemma)下中国人合作行为影响的研究已得出了有意思的结论: 增强认知信任的结果是因为搭便车而减少合作, 而只有增强情感信任才能促进合作(Ng & Chua, 2006)。可以预期, 工具信任与情感信任对于民众合作行为的影响, 即使不出现方向上的正负对立, 至少也会在强度的表现上有所不同。

2.3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及结果依赖性的调节作用

作为合作行为的两个重要的前因变量, 公正感和权威信任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Greenberg & Colquitt, 2005; 张婧, 王二平, 2010)。源自公正感启发式理论(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Lind, 2001)的研究表明, (程序)公正感会影响权威者的信任水平, 即权威信任是程序公正的结果变量(Aryee, Budhwar, & Chen, 2002; De Cremer, 2004)。程序公正既可通过权威信任的调节作用影响人们的合作意愿(De Cremer & Tyler, 2007); 也可以通过权威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追随者的自尊水平(Langendijk, van Dijke, & De Cremer, 2009)。已有研究中权威信任的对象主要是权威者个体(如领导), 且较少涉及分配公正与权威信任的关系。而政治信任作为国家组织情境下的权威信任(Citrin & Muste, 1999), 属于非个人化的机构信任。社会公正对其的作用及二者对合作行为的影响机制尚缺乏实证支持。根据前述, 分配公正与工具信任均为结果导向, 程序公正与情感信任均为过程导向。由此, 本研究提出民众对政府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分配公正侧重于通过工具信任来作用于合作行为; 程序公正侧重于通过情感信任来作用于合作行为。前一路径属于合作行为的外部动机; 后一路径属于合作行为的内部动机。本研究正是在这一模型的框架下, 为社会公正通过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提供实证支持。

新近研究发现, 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中, 存在着另外一个独立的影响变量——结果依

赖性(outcome dependence) (Clark & Wegener, 2008)。政治信任的提升不仅取决于程序公正和有利的结果, 还受制于民众对结果的依赖(van der Toorn, Tyler, & Jost, 2011)。所谓结果依赖性指对某一权威的依赖, 该权威控制着个体想要的社会或物质资源(van der Toorn et al., 2011), 包括个体的精神和身体健康, 安全以及经济福利等(Fiske & Berdahl, 2007)。可见, 结果依赖性的本质仍是一种权力关系。那么, 在结果依赖性的不同水平下, 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机制是否不同? 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研究。一个日常的经验是, 倘若结果依赖性较高, 人们会更期待公正。如当油价上调时, 有车族(结果依赖性高)比无车族(结果依赖性低)更希望无论从结果上还是程序上, 政府的调价行为都能够体现公正。因此, 探讨结果依赖性对于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的调节作用及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在中国背景下, 具有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意义。

2.4 研究问题

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是影响民众对政府合作行为的重要因素。尽管这一观点已获得普遍认可, 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 还没有全面探讨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实证支持, 更无法进一步揭示其作用于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鉴于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本研究提出如下科学问题:

社会公正(分配公正与程序公正)是否通过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双路径模型的中介作用影响合作行为?

结果依赖性是否会调节社会公正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其调节效应的作用机制如何?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力图揭示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路径模型, 并探明结果依赖性对这一路径模型的调节作用。根据本文的研究建构, 我们设计了概念模型, 如图1所示。路径上的圆圈表示需要关注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相对应于上述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内容可分解为如下两个子研究, 每个研究只解决概念模型中部分变量之间的关系。

3.1 研究一：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研究一探讨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作行为的作用机制, 建立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基于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提出如下6个(组)假设:

H1: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社会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H1a: 工具信任部分中介分配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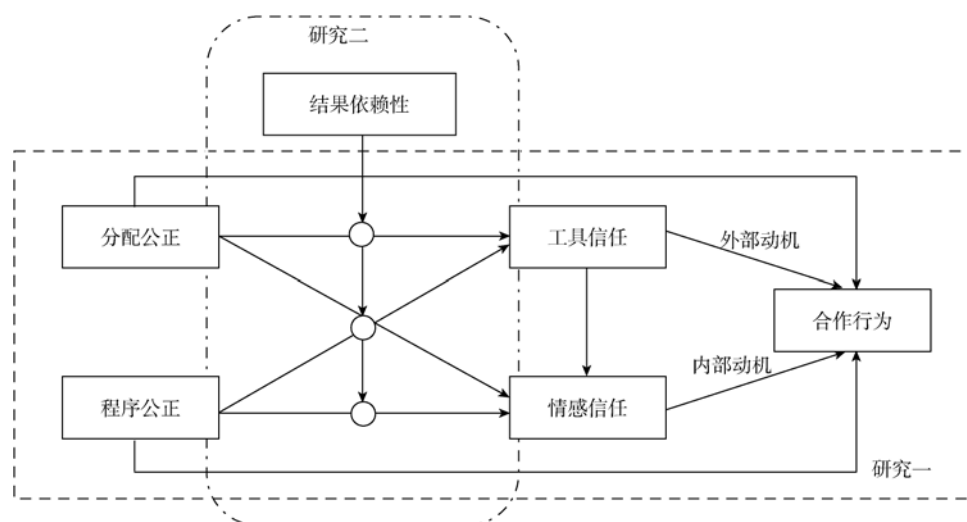


图1 本研究概念模型即变量间关系图

H1b：工具信任部分中介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H2：情感信任部分中介社会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H2a：情感信任部分中介分配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H2b：情感信任部分中介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的关系；

H3：分配公正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情感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作用；

H4：程序公正通过情感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作用强于其通过工具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中介作用；

H5：工具信任对情感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H6：情感信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大于工具信任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3.2 研究二：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到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结果依赖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二探讨作为调节变量，结果依赖性如何调节民众的社会公正感与政治信任到合作行为的作用路径。考察在结果依赖性高和低的条件下，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到合作行为的路径模型有何差异，以及在该调节效应中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提出如下3个(组)假设：

H7：结果依赖性是社会公正影响合作行为的调节变量；

H7a：结果依赖性分配公正影响合作行为的调节变量。具体而言，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结果依赖性高时分配公正与合作行为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H7b：结果依赖性是程序公正影响合作行为的调节变量。具体而言，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结果依赖性高时程序公正与合作行为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H8：结果依赖性的调节效应通过工具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实现；

H8a：分配公正和结果依赖性的交互作用首先影响工具信任，进而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表现为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结果依赖性高时分配公正和工具信任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H8b：程序公正和结果依赖性的交互作用首先影响工具信任，进而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表

现为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结果依赖性高时程序公正与工具信任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H9：结果依赖性的调节效应通过情感信任的部分中介作用实现；

H9a：分配公正和结果依赖性的交互作用首先影响情感信任，进而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表现为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结果依赖性高时分配公正与情感信任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H9b：程序公正和结果依赖性的交互作用首先影响情感信任，进而对合作行为产生影响，表现为相对于结果依赖性低的情况，结果依赖性高时程序公正与情感信任的正向关系更密切。

上述两个研究探讨的科学问题逐渐深入：先考察未区分不同条件时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再关注不同结果依赖性条件下该模型是否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模式。这些研究是将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作行为的作用条件逐步细致化和复杂化，两个研究之间并不存在包含关系，后一个研究的实施也不依赖于前一个研究的结果。

3.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将综合应用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experiment)、现场研究(field experiment)和问卷调查研究(questionnaire survey)的方法，全面探讨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作行为的作用过程。研究一拟采用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对社会公正的类型进行操纵，然后测量被试的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再收集他们所采取的合作行为，以此建立民众的社会公正感作用于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同时操纵社会公正的类型与结果依赖性，通过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考察结果依赖性如何调节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作行为的路径模型。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政治信任的测量与合作行为的收集。研究结果应用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叶宝娟，温忠麟，2013；张书维，2013；张书维，王二平，周洁，2012)。这种分析方法综合了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分析思路(Baron & Kenny, 1986)，也是通过一系列层次回归，比较多个回归方程的回归系数和方差解释量的变化，不同之处在于对交互作用(即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的分析更加深入和复杂。最后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选择一定区域的城乡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收集被试对

社会公正的感知及其结果依赖性的程度; 然后测量被试的工具信任、情感信任以及采取合作行为的意向。研究结果同样应用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来检验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的生态效度。

4 预期结果与研究意义

本研究通过实验室研究的变量操纵, 可以看到由社会公正与结果依赖性变化引起的路径模型差异, 为调节变量影响路径模型提供更加有力的因果关系证据。同时实验室研究中采用的变量操纵范式均可以迁移到现场研究中, 以克服实验研究中(大学生)样本的局限性。再加上最后的问卷调查, 三种方法相互补充, 预期可以探明社会公正(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经由政治信任(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过程机制, 并能够辨别出结果依赖性高和低的条件下, 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到合作行为的路径差异, 以及在该调节效应中工具信任和情感信任的中介作用。最终建立包含调节变量及其作用机制在内的完整路径模型。基于这一模型, 可总结出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和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 有针对性地制定控制过程变量、干预调节变量的措施, 并通过改变民众的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提升其对社会公正的感知, 增强其政治信任, 进而促进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 为政府部门进行公共管理提供政策建议。

本研究尝试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理论贡献。首先, 探讨了合作行为领域中新的研究问题。先前研究从未涉及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其对政府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本研究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建构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作用路径模型, 并从调节变量角度分析该模型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作用模式。这些结果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对已有研究领域的发展, 并将给公共管理实践部门准确预测和有效促进民众对政府的合作行为提供理论指导。其次, 研究方法和路线上有所创新。本项目采用实验室实验、现场研究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考察社会公正与政治信任影响合作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及其调节变量, 并引入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不但回答了调节变量的作用模式, 还揭示了调节变量的作用机制。但由于该方法理论较为复杂, 目

前尚未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采用这种方法, 不但可以更加全面地揭示民众的社会公正感影响合作行为的过程和条件, 还可以为推广这种统计分析方法提供样例和实证数据。

参考文献

- 胡锦涛. (2012).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李骏, 吴晓刚. (2012).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 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 (3), 114–128.
- 孟天广. (2012). 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 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 *社会*, 32(6), 108–134.
- 孙明. (2009). 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 *社会学研究*, (3), 78–88.
- 王二平. (2009). 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学分析. 见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师范大学 (编), *科学发展, 文化软实力与民族复兴 (上卷)* (pp. 329–338).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韦惠民, 尤丽荣. (2009). 主管认知信任和情感信任对员工行为及绩效的影响. *心理学报*, 41(1), 86–94.
- 熊美娟. (2010).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公共行政评论*, 4(6), 153–180, 203.
- 叶宝娟, 温忠麟. (2013). 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检验方法: 甄别和整合. *心理学报*, 45(9), 1050–1060.
- 尹继武. (2008). 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 *国际论坛*, (2), 55–61.
- 张婧. (2010). 当局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分配公正感和程序公正感的中介作用.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科学院.
- 张婧, 王二平. (2010). 社会困境下政治信任对公众态度和合作行为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18(10), 1620–1627.
- 张书维. (2013). 群际威胁与集群行为意向: 群体性事件的双路径模型. *心理学报*, 45(12), 1410–1430.
-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心理学报*, 44(4), 524–545.
- Aryee, S., Budhwar, P. S., & Chen, Z. X. (2002). Trust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work outcomes: Test of a social exchange mode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3, 267–285.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 Chanley, V. A., Rudolph, T. J., & Rahn, W. M. (2000).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public trust in government: A time series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4(3), 239–

- 256.
- Citrin, J., & Muste, C. (1999). Trust in government. In J. P. Robinson, P. R. Shaver, & L. S. Wrightsman (Eds.),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measure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Vol. 2, pp. 465–532). San Diego, CA, US: Academic Press.
- Clark, J. T., & Wegener, D. T. (2008). Unpacking outcome dependency: differentiating effects of dependency and outcome favorability on the processing of goal-relevan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 586–599.
- Colquitt, J. A., Conlon, D. E., Wesson, M. J., Porter, C. O. L. H., & Ng, K. Y. (2001). Justice at the millennium: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25 year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research.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 425–445.
- De Cremer, D. (2004). The influence of accuracy as a function of leader's bias: The role of trustworthiness in the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293–304.
- De Cremer, D. & Tyler, T. R. (2007). The effects of trust in authority and procedural justice on cooper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2(3), 639–649.
- Deutsch, M. (1975). Equity, equality and need: What determines which value will be used as the basi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1, 137–149.
- Deutsch, M. (1985). *Distributive justice: A 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iske, S. T., & Berdahl, J. L. (2007). Social power. In A.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Social psychology: A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pp. 678–6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lger, R. G., & Cropanzano, R. (1998).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reenberg, J., & Colquitt, J. (2005).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Mahwah, NJ, U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Gustafsson, B. A., Li, S., & Sicular, T. (2008).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therington, M. J. (1999).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trust on the presidential vote, 1968–96.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3, 311–326.
- Hetherington, M. J. (2005). *Why trust matters: Declining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demis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uq, A., Tyler, T. R., & Schulhofer, S. (2011). Why does the public cooperate with law enforcement: The influence of the purposes and targets of policing?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7(3), 419–450.
- Jost, J. T., & Kay, A. (2010). Social justice: Histor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 T. Fiske, D. T. Gilbert, & G. Lindzey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5th ed., pp. 1122–1165).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 Langendijk, G., van Dijke, M., & De Cremer, D. (2009). How power and trust explain procedural fairness effects on self-esteem. *Netherland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 119–126.
- Levi, M., & Stoker, L. (2000). Political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3, 475–507.
- Lind, E. A. (2001). Fairness heuristic theory: Justice judgments as pivotal cognitions in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In J. Greenberg & R. Cropanzano (Eds.),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Allister, D. J. (1995). Affect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8, 24–59.
- Mishler, W., & Rose, R. (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1), 30–62.
- Murphy, K. & Tyler, T. R. (2008). Procedural justice and compliance behaviour: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8, 652–668.
- Ng, K. Y., & Chua, R. Y. J. (2006). Do I contribute more when I trust mor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ognition- and affect-based trus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1), 43–66.
- Oreg, S., & van Dam, K. (2009). Organizational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 127–135.
- Rankin, L. E., & Tyler, T. R. (2009). Justice and cooperation. *Netherland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 146–154.
- Rudolph, T. J., & Evans, J. (2005). Political trust, ideology, and public support for government spen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3), 660–671.
- Schaubroeck, J., Lam, S. S. K., & Peng, A. C. (2011). Cognition-based and affect-based trust as mediators of leader behavior influences on tea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6(4), 863–871.
- Scholz, J. T., & Lubell, M. (1998). Trust and taxpaying: Testing the heuristic approach to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2), 398–417.
- Shi, T. J.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4), 401–419.
- Sunshine, J., & Tyler, T. R. (2003). The role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legitimacy in shaping public support for policing. *Law & Society Review*, 37(3), 513–548.
- Thibaut, J. W., & Walker, L. (1975). *Procedural justice: 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Hillsdale, NJ: Erlbaum.
- Tyler, T. R. (2008). The psychology of cooperation. In B. A. Sullivan, M. Snyder, & J. L. Sullivan (Eds.), *Cooperation:*

-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of effective human intera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Tyler, T. R. (2009). Procedural justice, identity and deference to the law: What shapes rule following in a period of transi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1, 32–39.
- Tyler, T. R. (2011a). *Why people cooper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yler, T. R. (2011b). Trust and legitimacy: Policing in the USA and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8(4), 254–266.
- Tyler, T. R. (2012). Justice and effective coopera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5(4), 355–375.
- van der Toorn, J., Tyler, T. R., & Jost, J. (2011). More than fair: Outcome dependence,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the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authority figur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7, 127–138.
- Verboon, P., & Goslinga, S. (2009). The role of fairness in tax complianc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Psychology*, 65, 136–145.
- Watson, A. C., & Angell, B. (2013). The role of stigma and uncertainty in moderating the effect of procedural justice on coope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police encounters with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es. *Psychology, Public Policy and Law*, 19(1), 30–39.
- Wegener, B. (2000).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social justice approach: Introduction.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3(2), 75–82.
- Whyte, M. K. (2010).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ng, T. K., Wan, P., & Hsiao, H. M. (2011). The bases of political trust in six Asian societies: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explanations compa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2(3), 263–281.
- Wu, X. N., & Wang, E. P. (2013). Outcome favorability as a boundary condition to voice effect on people's reactions to public policymaking.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 329–337.

Soci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Trust: The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ZHANG Shuwei¹; XU Zhiguo²; XU Yan³

(¹ Center for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School of Govern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²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510225, China)

(³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People's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affects their political trust, which influences their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Mass incidents, which refer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certain civilians and local administration, are typical non-cooperative behavior in China. However, for the lack of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or political trust, there is no investigation on the process and condition on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In this research, social justice is divided into distributive justice and procedural justice, and political trust is divided into instrumental trust and affective trust.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social justice and cooperation with the methods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 field experiment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t aims to construct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cooperation by instrumental trust and affective trust. Furthermore, this study will also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outcome depen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justice and cooperation.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it will construct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cooperation and its moderate mechanism. Regarding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is research will examine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underlying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 in China by examining motivation, thus informing administrators and policy makers on how to promote intergroup cooperation in response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social justice; instrumental trust; affective trust; outcome dependence; cooperation